

诗海寻踪

杜甫在夔州学术研讨会 传统诗词与当代社会研讨会
论文汇编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编



CS1060578

诗海寻踪

——杜甫在夔州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
缙云山传统诗词研讨会

936120

I267

01811



75

前 言

文史研究 探索前进

组织文史馆员开展文史研究，是文史馆的主要工作之一。全国不少文史馆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相形之下，重庆文史馆这项工作有些滞后。我馆决定以开展学术研讨会为契机，以求逐步推进，打开局面。为此，我馆于2000年5月27日在奉节县与夔州杜甫研究会联合举办“杜甫在夔州学术交流会”。会议由副馆长王群生，夔州杜甫研究会会长胡焕章主持。我馆馆员卢季野、陈淑宽、钟全昭、董味甘、陈大慧、梁上泉宣读了论文，馆员野谷作了口头发言。夔州杜甫研究会胡焕章、余敬之、刘书东等宣读了论文。就杜甫在夔州的行止，杜甫人格和诗歌风格的成因，杜甫寓夔州创作丰硕的原因等问题进行了研讨。《涪陵师专学报》执行主编冉易光莅会，并在该学报上发了座谈会纪要和一组论文，对这个会议予以高度评价。同年10月11日—13日，我馆与北碚缙云诗社在缙云山联合主办“传统诗词与当代社会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副馆长王群生主持。我馆副馆长彭伯通，馆员董味甘、卢季野、童明伦、陈大慧、陈淑宽，《重庆艺苑》编委刘友竹宣读了论文；馆员野谷、梁上泉作了口头发言。缙云诗社张长炯、李萱华、王力之、周顺之宣读了论文或发言。就传统诗词是否应该改革，如何改革；传统诗词如何反映当代生活等问题进行了争鸣，大家坦诚地交流了观点，讨论十分热烈。副馆长谢荣忠作了总结发言。《重庆政协报》发了专文

《传统诗词与当代社会学术讨论观点集粹》，《重庆商报》及时作了报导。

两次学术研讨会共收论文 20 余篇，有一定学术价值。兹选刊由我馆组织的论文，辑为专集，以供交流。

编 者

二〇〇一年十二月

目 录

前言

在夔州诗词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群生 (1)
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观照杜甫·····	卢季野 (2)
杜甫夔州行止粗探·····	陈淑宽 (7)
诗城朝圣·····	梁上泉 (11)
杜甫《登高》浅析·····	陈大慧 (13)
试评旧注杜甫《鹦鹉》诗的得失·····	董味甘 (16)
传统诗词中的“捣衣”一词释疑·····	钟全昭 (27)
传统诗词格律浅说·····	彭伯通 (30)
论中华诗词之用韵·····	童明伦 (34)
关于传统诗词创作的几个问题·····	陈大慧 (42)
属对律切 沾丐后人·····	刘友竹 (47)
关于旧体诗词反映现代生活的一点体会·····	蔡淑萍 (57)
漫说“孤雁出群”·····	王淡芳 (60)
关于当代传统诗词的几个问题·····	卢季野 (70)
试论传统诗词的继承和发展·····	陈淑宽 (81)
诗词之本与写作之道·····	董味甘 (93)
论诗与史·····	童明伦 (129)

在夔州诗词研讨会上的讲话

王群生

新千年首岁初夏，重庆市文史研究馆与奉节县夔州杜甫研究会，在这白帝城下，面对赤甲、白盐，联合举办、共同召开“‘杜甫与夔州’学术交流会”，确实是别开生面、意义独具。

今天，前来诗城奉节参加学术交流会的，有市文史馆和杜甫研究会部分专家、学者、诗人，将对华夏一代诗圣——我国历史上的盛唐著名诗人杜甫，对他晚年、也是其诗歌创作高峰期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的创作、生活，进行一次实地的考察研究、深入探讨，大家都怀着同样的激动与感奋心情。

杜甫的晚年，在夔州前后生活了近两年。两年时间虽然不长，但在这里却留下了他传世诗作 1200 余首中的三分之一以上，且大都是其成熟时期的代表力作，达到了整体与生命的辉煌。对这样的特殊文学现象，能进行实地考察、现场探讨，于我们这些泱泱诗国的后来者，当然感到十分的必要、格外的亲切。

诗仙李白，以浪漫主义行时；诗圣杜甫，以现实主义著世，都在夔州、白帝城留下过名满天下、脍炙人口的瑰丽诗篇；而著名诗人刘禹锡，也在夔州以民歌入诗，创制、开闢了“竹枝词”的先河。他们都对中华文学（尤其是诗歌），产生过巨大的影响。自古以《巴人乐》、《巴歌》、《渝唱》名世的巴渝地区——今天的重庆，如今也是一个诗歌大市。从重庆文学史的角度审视，当代的重庆诗人们，无不是吸纳了李杜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精神，以及民歌俚曲的营养，才开创了今天的一代诗风。

下面，想听到诸公的高见。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一级作家、诗人）

从文学史和文化史的角度观照杜甫

卢季野

（一）从历代对杜诗的评价中，我们能汲取些什么？

杜诗评家蜂起，号称千家注。但在文学史上对杜的评价，却是褒贬互见的。大率宋人评价极高，明、清特别是现代偏低。最早肯定杜诗的是黄庭坚。他在《大雅堂记》、《刻杜子美巴蜀诗序》特别是《与王观复书》中均有高评。公允精当则推严羽《沧浪诗话》：“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而集高评之大成的，则应是元稹。他在《杜君墓志铭并序》中说：“杜诗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但朱熹则贬评。他在《诗人玉屑》中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明胡应麟亦贬：“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视其中年，精华雄杰，如出二手”。赵翼亦近似，他在《瓠北诗话》中说：“黄山谷谓‘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之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唯《秋兴八首》……意味悠久，其它则意兴衰飒……，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最突出的要数杨慎。他在《升庵诗话》中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论诗也。”

到近现代则有胡适，竟妄称杜诗为“打油诗”。至于郭沫若，则可谓集古今扬李抑杜之大成者。他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说：“杜有上千株果树，应是一位庄园主了。”意即杜在夔州当了小地主，所以写不出好诗。郭又说：“与其称诗圣，毋宁称诗

佛”。正如众所周知：郭之有此，固不在于不懂诗，而实出于诗以外的因素。到了文革前后，则已不是评价，而是迹近于笑话了。如1961年北京某大学忽然发起批判杜甫的名诗《兵车行》，据说杜“分不清正义和非正义的战争”，犯了“和平主义错误”云云，俨然是用共产党员标准要求古人了。为此，华君武画了一幅著名的《杜甫检讨》的漫画登在《光明日报》。周总理见了曾哈哈大笑，而华却仍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

如何看待这些对杜的评价？我认为：除其中近现代的贬评可一言以蔽之曰：极左思潮的干扰，不必费辞外，值得注意的倒是历代一些贬评。这些贬评之所以不足为训，除文学修养、审美水平不足外，主要是悖离了文学批评必需知人论世的原则。评论一个作家，首先必须了解其时代、身世乃至性格。杜处于唐盛极而衰的大离乱之际，一生欲用世而不得志，穷愁潦倒。虽早年“初不屑以文士自甘”，但中年后却只得“他乡迟暮，不敢废诗篇。”这样的诗篇，正所谓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故杜诗特别夔州诗不外伤时感事，忧国忧民。即直陈时事，抒写性情，一句话，是写实的：社会的现实，心灵的真实。用今天的话说，即现实主义。可以说，杜甫是“愤怒出诗人”的光辉典型，这一命题虽是一个历史范畴，今天仍有她的生命力。而诗史的桂冠，其真谛亦在此。这哪里是什么“衰飒”呢？朱熹所谓“自出规模”，在古代诗文中与“不随人后”义近，正见得杜之创新，为什么“不可学”？至于郭沫若，他对杜的家世并未弄清。据曹慕樊先生考证：杜在夔州买了11亩田和一个柑园，家有10口人。按唐律令：杜一家占有土地，仅及一个农民占田的1/10，生活极拮据，口粮尚需借贷。如果“当了小地主写不出好诗”，岂不是等于说托尔斯泰也写不出好作品了吗？

作为中国文学的瑰宝，杜诗曾哺育了包括现代文学在内的一代又一代优秀诗人。即以重庆而论，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先后产

生过像何其芳、邓均吾、沙鸥等这样一批优秀的诗人及其诗篇。毫无疑问，新时期的重庆文学应当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杜诗的现实主义这份优秀文学遗产。

（二）杜甫对文学批评的贡献。

这主要见于杜的名诗《戏为六绝句》。此诗开创了以诗论诗的先河，主要探讨了对近代文学（齐梁）和现代文学（初唐四杰）是肯定或否定的问题，换言之，即文学遗产的继承问题。诗中提出的主要论点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和古典文论上都具有极重要的价值。

第一首：“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为最优秀的六朝诗人，否定庾即否定初唐四杰和唐新体诗，这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杜对庾充分肯定，这同李白的“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的态度截然不同。

第二首：“王杨卢骆当时体……”，这里的“当时体”是一个重要命题，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此首后来曾为毛泽东所引用。

第五首：“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此首警句、名句是第二句。这里的“清词”即《文心雕龙·风骨篇》中所指的风骨，丽句即文彩。杜甫认为二者应并重。用现代语言说，即立意要新，文笔要词采飞动。所谓思想性与艺术性结合的经典性原则，还在1300年前杜甫就提出来了。

第六首：“……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此首作为总括，提出不必纠缠古是今非定于一尊，应当以真为师，博采众长，学无常师。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命题，至今被奉为瑰宝。

（三）关于杜甫热衷“干谒”问题的辨正。

“独耻事干谒”是杜甫的诗句。然而，实际上李、杜均热衷于“干谒”，即奔走于朱门显宦：“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或许有人提出：杜甫作为人民诗人，为什么不可以“超然”一点

呢？这涉及到中国历史、文化史中“政统”与“道统”的矛盾，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是不可以妄论的。

如果说西方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体现为“超然”，则中国知识分子所缺乏的正是这种“超然”，即独立于“政统”之外的“道统”，这是中西知识分子的主要区别。这是因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既不同于以色列先知的直接诉诸超越性的上帝，也不同于希腊哲人对自然秩序的探索，而是不离人间日用伦常的实用理性，这就决定了“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参政意识。所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篇》）如此沉重的社会使命感确为世界文明史所罕见。

但这里所指的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她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感虽极相似，却不能等同。其区别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介入是以“超然”（虽则是有限的）为前提，他有自己的专业阵地，而古代知识分子却缺乏此种“超然”的保障——独立的文化或“道统”的组织阵地。这样，他们除“入仕行道”，“学而优则仕”外，别无选择，因此，他们不得不被迫“干谒”，这是中国古“士”的必然悲剧，这就是中国的国情。“道”与“势”孰尊？法家主张后者，而儒家主张前者。儒家理想主义者如孟子、范仲淹、海瑞皆凭道对昏庸之势作过悲壮抗争，但其结局都是“势”胜于“道”。因为中国的“道”自己不能实现自己，必须对象化，转型为势。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使命、理想固在“从道不从君”，但其现实途径则唯有从君——“干谒”，或者走“内圣”的道路。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选择无非：①海瑞式的抗势殉道；②隐居以行义，如陶潜、杜甫等；③屈从于势。

（四）杜诗在文体上的创新和贡献。

主要是在近体诗上创拗律，七绝上创变调。如果绝律常规代

表严密性，则拗、变代表随意性。杜喜传统又破传统，故云“即事非今亦非古”，“欲语羞雷同”。“非今”即不合律，“非古”则不必不合律。如传统古律诗，五言以上二下三为常，七言以上四下三为常。杜则破之：五言有上三下二句，如“闺八月初吉”（《北征》）；七言有上五下二句，如“中天月色好谁看”（《宿府》）等等。杜还有上下文承接用单句（反运意必双和每两句用意相连）和换韵不换意等创造。

开创了诗的散文化是杜诗的又一重大特色。如“英雄割据虽已矣。”（《丹青引》）；“将军魏武之子孙”（全）；“浮名安在哉”（《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去年米贵缺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等。杜“极诗之变”，实因盛唐时中国文学向小市民的过渡已酝酿成熟，杜诗的散文化即后来古文运动和小说兴起的滥觞。杜诗还有“理趣”的特点。如“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后游新津修觉寺》）；“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秋野》）等等，即不赘述了。

（作者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出版社副编审）

杜甫夔州行止粗探

陈淑宽

杜甫于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春天从云安（今云阳）抵达夔州。杜诗中《移居夔州作》、《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等作品对此次迁徙的起迄地点、季节特色、途中景况有明确的记叙、生动的描写。

到夔州后的最初四五个月，诗人居住在夔州城西郊，即今关庙沱上面山腰里的一处住宅，这就是所谓“客堂”或“山腰宅”。《客堂》与云安时期写的《客居》指的显然不是一个地方。“舍舟复深山，窅窕一林麓”。王嗣奭说：“客堂非前客居。客居前江后山，此云深山、林麓，见别是一所。当是移夔后作。”由于贴补生计，用乌骨鸡治风湿病，杜甫还在这里养了近百只的鸡群。这些鸡飞扑叫嚷，诗人不堪其扰，只得催促大儿子宗文编织篱笆把鸡圈起来。《催宗文树鸡栅》一诗写道：“自春生成者，随母向百翻。驱趁制不禁，喧呼山腰宅。”还说“墙东有隙地，可以树高栅。……”这就是杜甫在夔州的第一处居所：山腰客堂。

大历元年秋天，杜甫由山腰客堂移居西阁。关于西阁的地理环境，诗中描写甚多。“瞿唐夜水黑，城内改更筹。”（《不寐》）说明西阁在白帝城内。“端居滟滪时”（《夔府书怀四十韵》）说明西阁在滟滪堆的附近。“白帝城西过雨痕”（《返照》），说明西阁在白帝城西侧。“暝色延山径，高斋次水门”（《宿江边阁》）。江边阁即西阁。据关耆孙《瞿塘关行记》，靠近水门的高斋，就在关上。明夔州知府江权《杜工部祠庙记》说：“西阁在城内。唐夔州城在瞿唐关，与白帝城相连。西阁正对滟滪堆，工部诗所谓

‘次水门’、‘江边阁’皆指此”。这就是杜甫在夔州的第二个寓所。他在这里住了半年多时间，直到大历二年（767年）3月才从西阁迁居赤甲，住了不到一个月。

诗人是在欲离不离，无可奈何之中离开西阁迁居赤甲的。嫌西阁江壁陡峭，崖石拥塞，希望能迁到农村可耕作自食的地方去，是早有的意向。但西阁房主不让杜甫再住下去则是迁居的主要原因。他在《不离西阁二首》之一中设问：“不知西阁意，肯别定留人”？实际上是问房主人让不让他再住下去。第二首中又代西阁设答：“西阁从人别，人今亦故亭。”“亭”与“停”通，“平生耽胜事，吁骇始初经。”诗人颇有依依难舍，停留不去的意思。此中苦衷在《赠苏四偁》一诗中有较为明白的倾诉：“乾坤虽宽大，所适装囊空。肉食哂菜色，少壮欺老翁。况乃主客间，古来逼侧同。”本来在年前的《灋西寒望》诗中，杜甫就有“瞿唐春欲至，定卜灋西居”的打算，但此时租、购灋西果园的想法尚未落实，而西阁又必须离去，不得已只好搬到荒凉僻陋的赤甲暂住。再说赤甲春色宜人，环境清幽，诗人也差堪自慰。

《入宅三首》和《赤甲》就是描写新居环境和迁居景况、心情的。

“奔峭背赤甲，断崖当白盐。”新居背靠峻峭的赤甲山，面对白盐山的断崖削壁。“峡口风常急，江流气不平。”说明住宅在临近峡口的江岸。“卜居赤甲迁居新，两见巫山楚水春。炙背可以献天子，美芹由来知野人。”这里景色虽好，然而杜工部只能象普通山野老人一样过着一种晒晒太阳取暖，吃着野菜充饥而自得其乐的生活，大有朝野阔绝之感。

杜甫迁居赤甲不久，柏茂琳帮助他买得灋西四十亩果园和漕廨草屋数间，又租到东屯一部分公田。于是赶上春耕时节，立即迁居灋西。

大历二年（767年）暮春，杜甫由赤甲迁到灋西。这是他在

夔州寓居的第四个地方。

瀼西，即西瀼溪之西岸、实际位置就是今天的奉节县城。唐代这里名叫西市，有场镇，人口比较密集。从北宋起，夔州府治重新迁至瀼西，这里便日益繁荣起来，而白帝城则逐渐冷落。陆游《东屯高斋记》说：“白帝城已废为邱墟”，而瀼西则“画为阡陌，裂为坊市”了。

瀼西果园盛产柑橘，其他水果也很多，山楂、梨子、酸梅、杏子、花红、苹果，甚么都有（见《竖子至》）。为了解决一家的生计问题，杜甫来去奔忙管理瀼西果园和东屯的稻田，有时还要亲自参加劳动。“此邦千树橘，不见比封君。养拙干戈际，全生麋鹿群。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身世双蓬鬓，乾坤一草亭。……细雨荷锄立，江猿吟翠屏。……”（《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诚如仇兆鳌所说，诗人“托居于此，不过为养拙全生计耳。”

大历二年（767年）8月，杜甫从瀼西移居东屯。这是杜甫在夔州寓居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地方。

东屯是历史上公孙述驻兵屯田的地方。杜甫东屯故居，确有其地可考。曾任夔州通判的伟大诗人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写道：“予至夔州数月，吊先生遗迹，则白帝已废为邱墟，况所谓高斋乎！瀼西盖今夔府治所，……高斋尤不可识；独东屯有李氏者，居已数世，上距少陵，才三易主。大历中故券犹存。”与陆游同时代的于栻在《东屯少陵故居记》中说：“峡中多高山峻谷，地少平旷。独东屯，距白帝五里而近，稻田水畦，延袤百顷，前滞清溪，后枕崇冈，树林葱蒨，气象深秀，称高人逸士之居，少陵于是卜居焉。……少陵既出峡，其地三易主，近世属李氏。少陵手书之卷犹存。”杜甫东屯草堂故居，世代相传，为当地人所熟知。到了近代则为“诗圣杜工部祠堂”。现白帝乡供销社及中心小学一带即其旧址。

《自瀘西荆扉且移居东屯茅屋四首》之一写道：“白盐危峽北，赤甲古城东。平地一川稳，高山四面同。烟霜凄野日，稔稻熟天风。人事伤蓬转，吾将守桂丛。”诗中对东屯方位环境的描写与前面的记载是相符的。

杜甫在寓居瀘西时就写了不少关于东屯稻田的诗，如《行官张望补稻畦水归》等等。现在粳稻熟了，为了做好秋收的督导和管理，所以全家移居东屯茅屋。虽然以后还不时到瀘西料理果园的事，但从此没有迁居其他住所，直到大历三年（768年）我们伟大的诗人离开夔州放船出峡为止。

（作者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文艺评论家）

诗 城 朝 圣

梁 上 泉

登望夔州依斗门，长怀杜甫夔州吟；
每从峡口诗城过，总作攀高朝圣人。

记得我第一次过夔州，是1956年冬，当小火轮靠向奉节码头时，便趁开船入峡的空隙，急步登上古城，城门上“依斗门”三字，自然使我想起杜甫“每依北斗望京华”的诗词。由于我年少即酷爱杜诗，诗中那些夔州之作，都引起我崇敬之情。此后我曾多次来这里实地走访，感受就一次比一次深切。此次随重庆市文史馆专程来参与夔州杜甫研究会联合主办的研讨交流会，就更有一种朝圣之感。当我住进诗城宾馆，在床上久不能寐，即成如下之吟：

头枕峡山足踏江，夔门涌浪雾迷茫，
历来多少诗家过，定有涛声入梦乡。

奉节被誉为诗城，的确名实相符。这里除杜甫、李白来往于此外，还有白居易、刘禹锡、陆游、王十朋等诗人在这留下不少名篇。这些后之来者，也许同我们一样受过李杜诗的影响吧！在我早年写的《山泉》一诗，第一节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洁/细流入大江/大江喷白雪”，显然，这是从杜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化出来的；古风《哀蚕妇》和《老农》等较长之作，也明显是受杜诗“三吏”“三别”的感悟，学写于解放之前。前者叙述一蚕妇预卖生丝、适逢债主索债，使买米续炊成为泡影，返家又来甲长催逼捐税。她悲愤绝望，“出借钱米晚回迟，买得猪肉和毒烹”以全家自杀表示抗议；后者则是记一老农的悲剧人

生：长男贫病而死，二子和三子被拉壮丁，女儿被兵匪糟踏，房屋被焚毁，老人“苦将薄土全卖出，生涯无依作人仆”。这些都是根据我耳闻目见的实事笔录下来的习作。郭沫若曾题联草堂：“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作为一个诗歌作者，自应诚心效法。1993年8月，我曾写《民工潮》五律二首，描绘负重挤车外出的山民，“好梦绕沿海，打工度九秋，夜来思故土，谁为解乡愁？”和“中青皆去远，老少仅留乡，贫苦生游子，炊烟绕屋梁”，发出了“草多地半荒”、“秋收归应早”的呼声；再如《山路上》、《都市村姑》、《行道树》、《悬挂的心》等“六弦琴”短曲，多得惠于杜诗。在形式格律上，是作为语体新绝句来探索；在选择题材上，是想按《又呈吴郎》那样去关注普通人的生活。

顺便再谈谈关于杜甫与李白的诗谊友情。他俩是同一个时代的大师，一个是现实主义的诗圣，一个是浪漫主义的诗仙。创作风格迥异，性格也各不相同，但这被称为双子座的大星，都相互关照，光耀诗史。在一起时，谈诗论文，同饮同游，彼此倾慕关怀，赞“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叹“借问别来太瘦生。只为从前作诗苦”；分离遭难时，寄语李白：“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惻惻”，“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寄语杜甫：“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读到这些感人肺腑的诗句，深感两人友谊的深厚诚挚，给我们今日诗坛，提供了光辉的榜样。

诗城朝圣，本在取经，经文无尽，潜在诗中！调寄《长相思》，填词一阕作结：

东瀼溪，西瀼溪，溪水绕城出阁西，汇流尽是诗。

诗仙师，诗圣师，绝唱名高夔峡低，英雄天下知！

（作者为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艺苑》编委，一级作家）